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兼谈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王效平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福冈县 北九州市 802-8577)

摘要: 本稿通过对日中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检视了近二十年中日经贸关系的演变及背景, 政冷经热即外交和政治交流冷淡而经贸交流热络的扭曲关系, 探讨了日本经济复苏迟缓的结构性原因, 同时对在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香港的地位与扮演角色的变化做了确认。最后展望日中相互合作、努力创造双赢机制致力于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 贸易依存度, 比较优势, 经济一体化, 中介功能, 日本模式, 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成果有目共睹, 改革旨在打破集权式计划经济的僵化管理体系的束缚, 引进市场机制, 开放政策则着力于招商引资, 培育国内市场,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力促产业经济的发展。而前者学习和引进了日本的宏观调控政策、循序渐进地放松管制, 最终着手所有制改革, 以激活产业经济; 后者则以设立经济特区政策为象征, 得益于以港澳为媒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华南和沿海的比较优势, 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并逐渐推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提高。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经济变革的两个层面, 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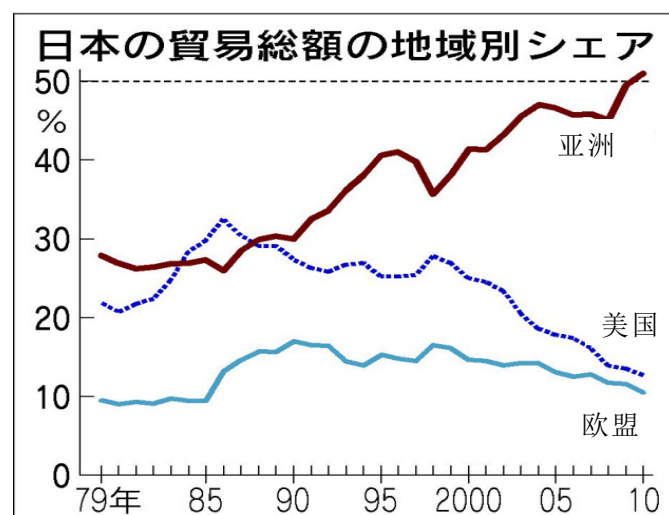
本稿通过对日中官方统计资料分析, 检视了近二十年日中经贸关系的演变及背景, 政冷经热即外交和政治交流冷淡而经贸交流热络的扭曲关系, 探讨了日本经济复苏迟缓的结构性原因, 同时确认了在日中经贸关系发展中香港的地位与扮演角色的变化。最后展望努力创造双赢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中日经贸关系演变的特征

（一）中日经贸依存度的变化

日本贸易总额分地区所占份额的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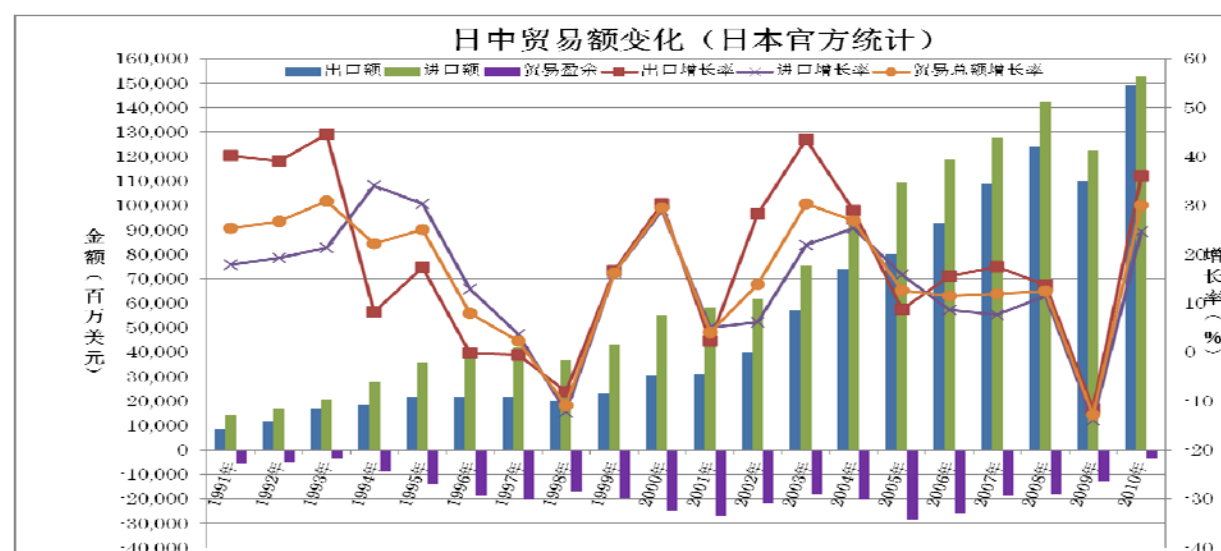
图表 1



资料来源：“アジア貿易 5 割突破、中国以外に広がり”『日本经济新闻』2011 年 1

月 28 日。

图表 2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JETRO 贸易统计数据库作者作图

1、日中贸易总体走势与特征

纵观近 30 年来日本对外贸易关系的走势，我们发现日本对外出口主要对象区域中，亚洲区所占份额数年来已超过 50%，而对东亚地区贸易中中国所占近一半份额¹。下面将日中贸易发展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1）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大幅度增加

2007 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的对日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日中双方依赖度有变化，日对中贸易依赖度较中对日依赖度更大，其背景是中国积极推进全方位贸易，外贸规模急剧扩大，进出口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同期水平。日本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位次和重要程度相对在下降；但两者的贸易结合度近 30 年来续增且维持在 2 以上，中对日贸易结合度略高于日对中数值。这说明两国之间贸易规模和紧密度的扩大对各自的发展有着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

（2）经贸关系得到深化，投资和贸易互动效果明显强化。大批日资制造加工业投资中国促动企业内或产业内贸易比重增大²。有调查显示，日资在中国投资所设的企业参与的进出口始终占中日贸易总额的 50-60%。

（3）日中贸易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

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天然资源，原料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依赖性强，中国则仰赖日本的加工机械，半导体原配件，化工产品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维持一定垂直分工的架构下，近些年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对日出口明显增加，水平分工与

¹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0 年日本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较前年度增加 26.6%，与亚洲四小较前年度增幅为 24.5%，与中国增幅为 22.3%。显示亚洲市场的强劲增长带动日本经济爬出谷底。参阅“アジア貿易 5 割突破、中国以外に広がり”『日本经济新闻』2011 年 1 月 28 日。

² 作为投资方日资企业不断将主要加工和经营管理职能移植至中国，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对中大规模出口，带来“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资企业的海外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对既有产品需求要通过从海外加工基地进口来满足，产生“逆进口效果”。日本对中直接投资与日中双边贸易两者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形成良性互动。

日俱进。

2、中国积极务实的招商引资政策

中国政府持续奉行有利于出口创汇，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促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大国和主要直接投资接受国。随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增大，国内市场竞争的激化，政府转变策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确保能源供应，开拓国际市场。2009年5月出笼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将外资投资审批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审批手续大大简化、审查时间短缩，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根据商业部所公布的第11次五年计划（2006年—2010年），五年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计划额为600亿美元，而2006年—2009年的实际投资额已达1911亿3000万美元。这反映了随中国对外汇的流通管制放松，外汇资金和企业资金余力增强，企业投资意欲旺盛。颇值得关注的是，香港一直是最大的投资对象，而对日投资主要采用并购手段的案例增加。

反观中日之间直接投资，历年来日本稳占中国实际接受总额的第三或第四位，而日本主要智库对日资企业所作问卷调查显示，近十数年中国一直是日资“扩大投资”对象国家或地区中的最爱，尽管日中国绕钓鱼岛和东海油田开发立场存在严重分歧，企业投资行为最终是以“利益”为判断标准的。如JETRO最新调查报告所示，表示今后1—2年仍会扩大对中投资的企业数占65.2%³，2010年在中国经商盈利的企业占64.4%，较前年度增加12.6个百分点，而获利最主要理由则是“中国当地市场营销额增加（回答企业数的71.7%）”⁴。外资企业在亚洲选择主要经营职能部门所在地时，中国皆成为首选地，这种趋势仅是近几年出现的变化，说明中国市场开放度加大，投资环境改善之快。

³ JETRO『ジェトロ貿易投資白書2011』（中国部分第15頁）2011年版（原始資料：JETRO海外調査部『在アジア・オセアニア日系企業活動実態調査（2010年度）』）。

⁴ JETRO海外調査部『平成22年度日本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2011年3月，第11頁。

日资制造业靠其技术和品牌实力畅行天下。因日本国内投资成本的提高，周边东亚各国竞相以优惠条件招商，在地企业竞争力增强，大批日资企业将生产基地移至中国和东盟地区，华南地区的“三来一补”有相当部分有日资企业背景，其中香港的投资与贸易中介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表 3 海外企业布局商务据点职能时的优劣评价

2007年					2009年				
职能	日本	中国	印度	新加坡		日本	中国	印度	新加坡
亚洲区域中心	第一名						第一名		
制造据点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R&D 据点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一名	并立第二名	
后勤总部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物流据点		第一名					第一名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欧美亚洲外资企业对日投资关心度调查”，2007 和 2009 年资料。

从直接投资统计来看，日对中投资额所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率不过 10%，中国对日投资刚起步数年，但后者后来居上，瞄准日资的品牌和技术以并购渗透日本投资市场的案例明显增加。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为企业弥补自身品

牌与技术弱项的对日并购投资方式是相辅相成的。该动向反映了日中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和中国涉外投资政策逐渐趋于灵活。

图表 4 2010 年度的对日主要并购案

投资者	对象企业	内容
比亚迪	荻原	收购模具主工厂
山东如意	瑞纳	占股 41.8%
中信投资	东山薄膜	占股 63.12%
联想集团	日本电气	占新设控股公司 51%股权，接管整个电脑制造业务
湖南科嘉	松下	接管松下伞下三洋公司的电动车专用充电电池商务部
海尔	松下	并购松下伞下三洋公司的白色家电生产部门

资料来源:JETRO『貿易投資白書 2011』。

（二）“3. 11 震灾”的潜在影响

1、强震，海啸，与核泄露的发生与影响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性金融恐慌发生以后，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值部分景气指标已显示出复苏迹象之际，“3. 11 震灾”发生，对日本产业经济基础造成重创。

震灾区的东北地区为日本的粮仓，同时还是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研发生产基地，灾区生产线遭毁灭性的破坏，产业链被切断，鉴于日本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在世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正因为中国仰赖外部市场的加工贸易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特殊材料等依赖从日本进口，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的日资汽车厂和电子电机加工企业自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核电站核辐射外泄对农林牧渔业带来直接影响，中华经济圈各经

济体都限制了对日本食品进口，加紧核辐射检验。震灾对产业链的冲击以及相关对策等对日中经贸关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2、震灾对策过程中暴露出的机制矛盾

日本人遭遇重灾仍能处事不惊，沉着守序，深受世界赞赏，这反映了日本人民尊崇自然的国民性。不过灾后对策失灵暴露出日本治理机制的矛盾，招致“非天灾”而为“人灾”的责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核能外泄没有在危机（风险）管理计划中得到重视。抵御海啸的堤坝和护墙根本不到位。核泄漏发生以后，实际污染程度远超乎预期，由于政府控制信息，几经修改新闻发布数据，因起更大心理恐慌，抵毁了灾后对策效果。

（2）官厅与电力公司的暧昧关系被质疑，统治机制失灵。

（3）重建灾区的投资计划迟迟不能出笼，议会与内阁配合不力，决策缓慢，政党轮替效应没有得到发挥，使得灾区重建“特需”效果大打折扣。

（4）国民安全意识被颠覆，导致新一波消费低迷潮。

鉴于日本在汽车和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和这次震灾所暴露出的日本东北研发生产基地被摧毁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已无法排除将产业链上游产业基地外移的策略选择。相关产业加大对外投资步伐，新一轮的“产业空洞化”已在所难免。

（三）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日中经济大国易位的背景

日本二战后特别是进入高速增长期的195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奉行的以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政策，政府以产业政策、计划调节等手段，对经济实现管理和控制。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的初中级阶段，无疑起到矫正市场盲目性的作用，带动了高速增长。但随日本经济步入成熟阶段，日本式政府主导型模式似乎成了限制经济发展的桎梏，弊端和缺陷日益暴露出来。

我们可从下图观察到日本战后崛起后的高速增长，石油危机爆发后的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崩溃后近乎零增长的持续低迷，日本称发生经济泡沫崩溃的 1991 年至前世纪末经济迟迟得不到复苏的 10 年为“失落的 10 年”，尔后国民经济没有真正好转（亦有“失落的 20 年”之说）。而近二十年又是经济全球化快速进展的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动荡不安，新兴国抬头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2010 年日中经济规模排序易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日本退居第三。这对日本各界带来颇大的心理冲击。

就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或背景简要归纳如下：

1、日本模式的束缚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以高管制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内经济部门缺乏竞争。但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压力，日本这些制度导致国内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使综合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再加上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高龄化的加剧，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近半年，随欧美财政金融危机的浮现，西方主要媒体以陷入“日本化”（或“日本病”）形容西方经济萎靡不振。也就是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且对策无效，欧美主要国家似在步日本后尘，诸多政策手法和效果无异于日本，恐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复苏。所谓“日本化”的特征，可主要归纳于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征反映了经济低迷的现象层面和对策层面的因素，互为因果）。

（1）高负债（日本国债余额超过了 GDP 的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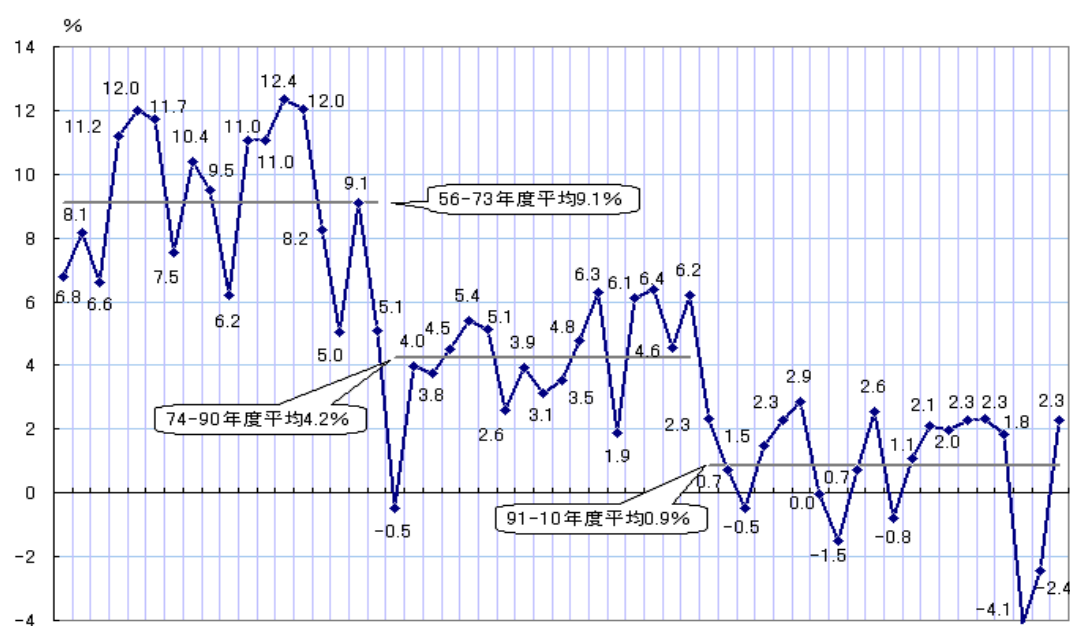
（2）长期实施零利率（央行放松银根和定量宽松）

（3）陷入通缩（股市指数低至 4 分之 1，地价降至泡沫顶峰时的 10%以下，CPI 持续下滑）

(4) 经济长期低迷，政府对危机的回应迟钝，决策不力且混乱。推迟了结构性改革和延长了痛苦期。

图表 5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経済成長率の推移



注：图中数值为各年度值，平均值为相关期间的单纯平均。

(注)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所公布 SNA。最新值发表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

2011 年 4-6 月期・1 次速報(2011 年 8 月 15 日)。平均は各年度数値の単純平均。

(資料) 内閣府 SNA サイト

尽管日本实现了执政党轮替，内阁和官厅的关系仍在延续，政局不稳定，决策缓慢，首相大臣交接频繁，导致政策欠缺连续性。

2、内需不振

日本家庭消费始终占国民支出的近 60%，日本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内需市场潜力之大是不容否认的。但自 1991 年经济泡沫崩溃以来，主张激活内需、采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呼声不断，从经济统计推断，内需贡献主导经济成长的局面似从未真正出现过。失业率上涨，潜在失业率更高⁵；劳动分配率持续趋低(02 年来平均工

⁵ 业绩恶化的公司着手裁员减薪，企业裁员对象已由短工、合同工已转向终身雇用制下的正式工。完全失业率居高不下，进入本世纪以来，劳动分配持续下降，同样冷却了

薪不增反降)；老龄化的进展，对社会保障制度崩溃的极度不安。

3、产业空洞化的影响

这表现在①吸引外资投资日本的政策力度弱，市场开放度不够，②带动经济发展的制造业对外部需求依赖度高，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形成极大压力，等两方面因素促使“产业空洞化”恶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日本资本主义模式所具有的排外情结却成为一种阻碍改革的环境劣势。长期以来，限制外资进入的多方面管制措施和日本企业独特的商业习惯，法人税率高等因素限制外资进入日本市场。这些因素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加之日元维持升值趋势，迫使内资出走。震灾后，日资组装加工业将会在海外重构产业链，加大在当地购配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比率⁶。

图表 6 主要企业下半年设定的美元汇率和汇率影响度

企业名称	企业设定的可承受汇率 (1 美元与日元兑换率)	影响度(亿日元)
丰田	80	340
日产	80	200
本田	80	150
铃木	80	10
索尼	80	0
松下	83	38
TDK	80	20
佳能	80	48
理光	80	13

消费市场的复苏。2009 年 7 月完全失业率创 1953 年有统计以来历史新高，达 5.7%，求人倍数（招工数÷求职者数）低至 0.42，创最低纪录，同样劳动分配（员工报酬）的减幅亦屡创历史纪录。就业景况恶化→家庭所得减少→消费低迷，通缩加剧→业界库存与产能过剩→新一轮裁员、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恶化，如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怪圈，对日本社会，对新政权无疑是很大的挑战。

⁶ 如 2011 年 5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东日本大震灾后的产业链的恢复与空洞化进展现状紧急问卷调查”结果所示，标本大型制造业企业有 69%回答“将产业链整体或一部分转移至海外的动作会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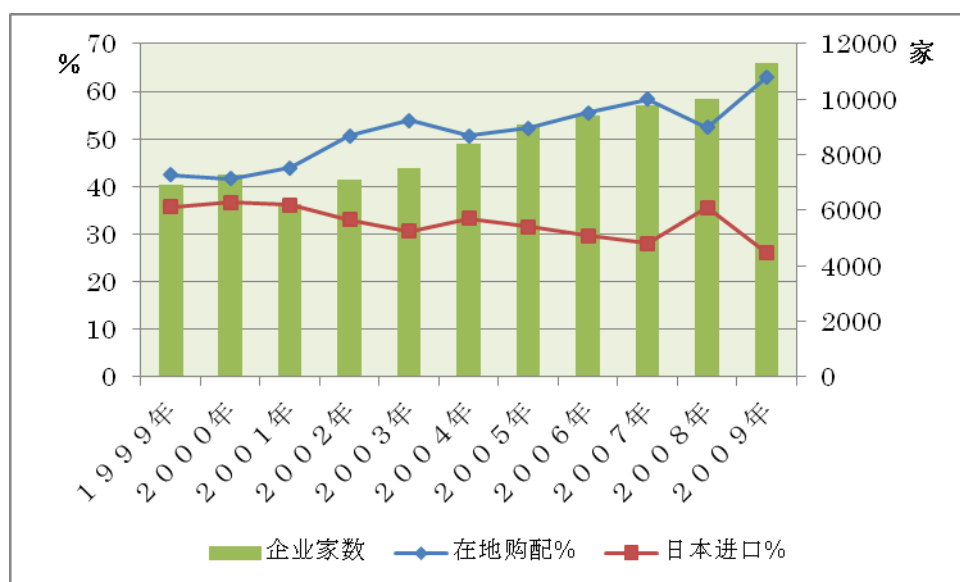
小松	82	45
日立建机	80	17
川崎重工	83	26

（注）影响度为每升值一日元给营销利润所带来的负影响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2011 年 8 月 27 日。

日本对外出口主要对象区域中，亚洲区所占份额数年来猛增已超过 50%，而单一出口对象国家中，中国和美国所占比率位居第一和第二。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以出口高附加价值的汽车·电机为主的美国市场急剧萎缩，中国为首的东亚市场的需求对日本经济发挥强劲的支撑作用⁷。震灾的冲击加之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形成极大压力。日本主要制造业领域的品牌企业对海外市场依赖度（反映在海外生产和销售比率上）逐年增高，如下表所示，日元持续升值对这些企业的收益带来颇大负面影响。

图表 7 投资亚洲的日资企业有扩大在地配购比率趋势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⁷ 汽车、电机、加工机械这三类高附加价值产品近 4-5 年来始终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 90% 以上；同为汽车出口大国，2008 年德国汽车主要出口市场前 5 国各占份额在 6-11%，而日本汽车总出口量的 30% 左右集中于美国市场，第二大市场加拿大仅占 3%。参阅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伊藤公二“世界经济同步萧条下的国际贸易变化与面临的课题”『2009 通商白皮书焦点解说』2009 年 7 月，第 28 页。

三、中日经贸关系中的香港因素

（一）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所面临的挑战

1、香港既有的优势

香港做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做为海外资本投资中国，内地资本海外投资和筹资的中介地和贸易中转港，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深了双方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也强化了其国际商务中心的职能。跨国公司基于其国际经营战略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国际商贸、避税地等优越的商务环境，积极拓展对东亚特别是中华经济区的投资和商务运营。

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方面，香港有她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一直维持包括外汇自由流通、简单低税率的税制、信息自由流通、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治环境及良好法治等制度或软环境的优越性；此外她的硬件（基础设施）条件也一直是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任何都市都无法比拟的，如与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主要城市之间航线稠密的空港、海港的功能完善的物流设施，延伸至大陆纵深腹地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等。

香港实施的简单、低税制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十分有吸引力，法人所得税率 16.5%，且对资本所得，股息和利息皆不征税，也不存在消费税或增值税，加之加快折旧扣除，法人的实质税赋很轻，同时个人所得税率仅为 16%。与大西洋，中美洲的曾是欧美殖民地的百慕达、维京岛、凯曼岛等典型避税地相比，除低税率外，且具十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经济规模，跨国公司可享受高效的商务服务，鉴于此，香港长期以来倍受跨国公司和资产家青睐，当作避税地（Tax Haven）和投资基地加以留意和利用。

2、香港面临的挑战

除英国统治 150 年所遗留下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回归后仍得到 50 年不变之保障外,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圈外向发展战略全面展开,香港地处中华区域中心与背靠大陆纵深腹地的地缘优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加深的大环境,上述国际商务中心的职能真正得以展现和发挥。国际大财团与跨国公司在此设立区域管理总部,大中小制造商利用香港的中介优势大胆推进珠三角加工贸易商务模式,随中国加入 WTO 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调整产业结构,外资转向开拓中国纵深的内需市场。

随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各地方主要城市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众多外资公司不需要通过港澳中介亦可较容易地直接进入内地开设制造或销售据点。对“97 回归”将使香港失去既有国际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自由度的担心曾经很强,香港的区域管理总部职能诚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应没有造成实质性威胁。

回归后的 10 数年间,香港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和 IT 泡沫崩溃,非典袭击乃至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恐慌的洗礼。随中国内地市场的更加开放,两岸实现“三通”,周边国家实施更具竞争性的政策,香港本身产业社会结构的变化等,都给香港带来挑战。港府作为一个高度自立的新兴政府,比旧殖民地政府更为注力于强化法体制,在维持其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同时,亦适度采取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因应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适度引进产业政策,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配合大陆所提供的 CEPA 政策,构建与珠江三角洲乃至大华南地区的产业分工协作机制,获得显著成效;吸引和留住精通英语和专业技能的金融人士、会计师和律师等,利用优秀的人力资源和制度优势,强化金融,财务,法律,咨询等高端商业服务等。

而随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验,作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职能。①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于亚洲地区,而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规模连年位居第一,②在香港境内的人民币存量不断增长,人民币贸易结算量

大幅上升,③香港是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成熟的监管经验,这些因素都决定了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地位。

位于东盟中心位置的东盟核心成员国新加坡,积极推进全方位外交,招商引资作为国策,展开与香港争夺亚洲区国际商务中心的竞争。两者曾同为英治殖民地,英语作为公用语言,法治透明度高;维持清廉高效的政府公务体制;自2002年始几经调降法人税率,由26%逐渐降至2010年17%;强化既有的国际物流和金融职能的同时,放宽绿卡和入籍限制招徕优秀人才来新留学和就业。日本产官学各界特别关注和评价新加坡的这些政策,把新加坡据点作为东南亚区域管理本部企业明显增加⁸。新加坡同样以华语华人和与中华区域的密切关系为卖点,招揽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的企业来此上市集资和投资。在服务业领域,其MICE(Meeting、Incentive、Convention Entertainment)产业振兴策略明显获得成功。

(二) 中日经贸关系中的香港中介地位

无可置疑,香港战后一直扮演着中国大陆的对外窗口和经贸中介地的角色,改革开放三十数年来,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前半期以国策投资公司为主,回归前后民营企业开始扮演投资和上市筹资的主要角色。这与香港特殊地缘和其本身软硬投资环境对大陆的吸引力密不可分。长期以来中国招商引资的特殊优惠政策,导致内外资之间竞争具不平等性,中国大陆企业借助港澳平台转投资国内的行为亦是合乎常理的。随国内投资优惠条件的削减(如废除既往特区优惠政策,统一法人税,限制加工贸易,减少出口退税等)经注册于港澳与其他避税地而转投资国内的企业会趋于减少。中港两地的直接投资统计资料显示,两者互为最大或主要投资者,大陆对香港近数年直接投资都维持在总投资额60—70%水准,截至2009年的累计直接投资额为164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67%;而行业分类中,以投资控股公司

⁸ 参见『周刊东洋经济』(日本)2011年7月16日,第64页。

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比率最高；总投资企业家数中民营企业占 77%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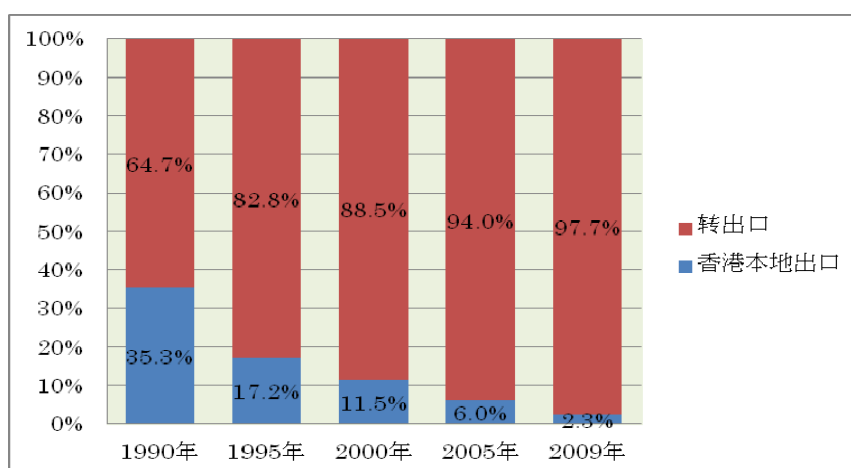
中日两国贸易总额除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短期微减外，一直保持大幅增长态势，而各自贸易统计皆显示对对方呈贸易逆差。这种显著的分歧源于双方对香港转口贸易的统计处理方法不同。两者对进口皆采用原产国（地）标准，日本对出口统计采用 FOB 运货抵达港为准，中国出口统计则以最终目的地为准。日本经香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被统计于对香港出口额中，经香港出口到日本的中国原产产品归入从中国的进口额。日方的本国原产品对中国出口额却少掉了经香港转口的部分，进口额则没有变动。中国则将经香港转口至内地的日本原产品计入从日本进口额中。根据香港海关转口统计，日本原产出口到香港的产品中转至大陆的比率始终高达 80%以上，而中国原产经香港转口到日本的产品仅占中国对香港出口的 6%左右。

从图表 8 可看出香港的转出口比重远较本地产品直接出口大得多，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图表 9 显示，主要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位居首位，其比重已占大约 50%，而美国和日本持续下滑。尽管日本所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例已不足 10%，鉴于对中转出口份额居高不下，日中之间围绕香港中转的统计处理误差还是不可忽视的，且这种统计处理仍会延续下去。

而香港本身是日本最大的农水产品出口市场，中华区域逐渐成为日本农水产品的主要消费地。震灾招致核泄漏和核污染废水往近海排放，港府率先限制日本东北地区农水产品进口，引起日方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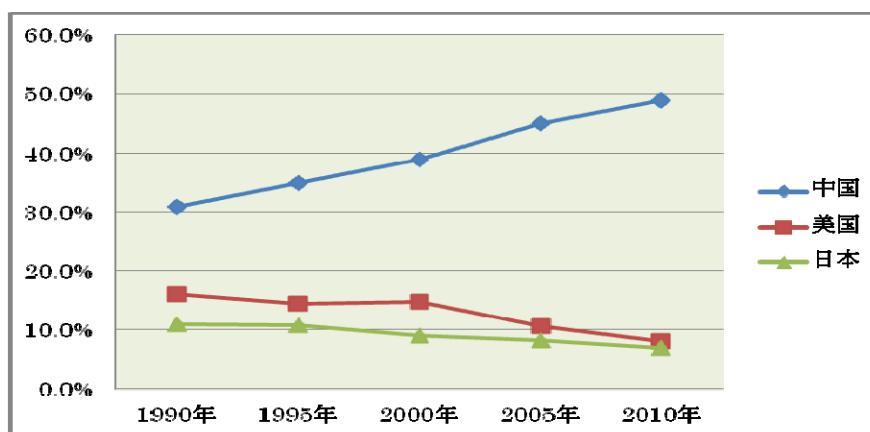
⁹ 参阅 JETRO『ジェトロ貿易投資白書 2011』

图表 8 香港的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图表 9 1990 年代后香港主要贸易对象国贸易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四、建立共赢关系的可能性

(一) 对中华经济区经济一体化客观认识不足

今年为辛亥革命 100 周年，中华地区竞相筹备各种庆典活动。笔者所在的九州地区曾是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准备武装起义时的落脚地，宫崎滔天，梅屋辰吉，安川敬一郎等友人志士为支持辛亥革命作出不匪奉献。九州地区民间团体曾数次举办研讨会，地方媒体年初以来做过数次纪念性报道，本地产官学界公开主张要抓住时机，作为历史上和文化上与中国有千丝万缕交流关系的特别区域，应该主动积极

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与此相比保守政客和主流媒体对中华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社会深层所发生的变化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客观认识不足，营造舆论强调日中之间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鼓励官民各界摆脱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加强与所谓价值观念接近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和产业界的密切合作。产业界为利益所驱动，如前节所述日本智库的调查结果以及官方经贸统计，都显示他们在对投资地作出理性选择。不过舆论导向对缺乏国际经商经验和外部信息的企业家和企业的投资判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中日经贸依赖度的上升与舆论所示好感度下降之间的反差

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年增长，进出口规模和增长率屡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已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进出口额已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强，大幅度超越美国，成为拉动日本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日中民众对于对方国家的好感度则出现大幅下滑，日本内阁府和民间机构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日本人讨厌中国，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所占比率局高不下，连年攀升。民间机构“言论 NPO”与中国新闻社今年 8 月所作调查成为近年来最为负面的民意调查结果¹⁰。该问卷调查“好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选项中，日本人对中国好感度下降的主因是去年九月发生的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附近海域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事件，其次是“在确保能源和粮食方面，中国所表现出来自私自利”带给日本国民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对（人）对其他亚洲（人）始终持有一种外露或潜在的优越感，首先应源于明治维新以后积极推进脱亚入欧国策的影响，再者则应归结于作为二战战败国被美国占领统治，能从战争废墟中再次崛起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维持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达 40 年之久的实际成功经验。日本称发生经济泡沫崩溃的 1991 年至

¹⁰ 该调查由日本言论 NPO 和中国日报社联合于 2011 年 6-7 月实施，具体执行由日方的世论综合研究所和中方北京大学零点研究咨询组织分担。详细参阅：認定 NPO 法人言論 NPO『2011 年第 7 回日中共同世论调查比较结果』2011 年 8 月，第 3-5 页。

前世纪末经济迟迟得不到复苏的10年为“失落的10年”，尔后国民经济没有真正好转，亦有“失落的20年”之说。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日本8分之1的中国，在20年后竟能追赶上乃至超越日本，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和被赶超，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焦躁和复杂情感。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日中经济产业结构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维持高水准的经贸依赖度，但进入新世纪后的近10年来，中日关系时常被用“政冷经热”加以形容。围绕对近现代史上侵略和被侵略立场认识的分歧，“911”以后国际政治外交立场的碰撞，围绕领土领海和海洋资源开发的争议等，都反映了两国国际政治立场各异，难以妥协。进入地缘上同属东亚的两强并立时代，利害冲突在所难免。在有必要重建日美同盟关系的舆论导向下，日本更积极地拉近和东盟印度的关系，围绕国际事务的处理，日中往往立场向左；日本着手修订对中贸易最惠国条款，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废除对中ODA的无偿援助部分，近期将会中止对中开发援助……、这些迹象显示日中之间确实有“政冷”加剧之感。

无论是营造日本与东盟印度建立更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的气氛，还是倡议参与环太平洋经贸合作组织（TPP）、推进经贸合作，日本似都难以削弱对中华经济区的依赖关系。强调继续利用港澳和新加坡的中介地位也好，或主张强化与台湾资本的合作也好，最终还是归结于能否发挥与已进入全方位开放轨道的十三亿中国市场，与已经步入一体化的中华经济圈市场默契合作的智慧。尽管日本经济已进入成熟时代，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似已褪色，经历着转型之痛，但日本产业经济的庞大技术积累、环保和民生领域的高端科技，对产品研发设计的执着和悟性，其独到的生产管理系统，都极其值得引进和借鉴。

中日经贸的稳定发展无论是对日本的经济复苏还是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可以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理应带来双赢效果。能否冷静接受现实，寻找积极有效且务实的合作途径，需要政治家秉持战略智慧。

参考文献：

- [1] JETRO『ジェトロ貿易投資白書』各年版
- [2] JETRO『ジェトロセンサー』2011 年 9 月号（特集「中国ビジネスの「攻」と「守」」）。
- [3] 「総力取材：九州」『日経ビジネス』2011 年 5 月 23 日号。
- [4] JETRO 海外調査部「平成 22 年度日本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
 - a) 2011 年 3 月
- [5] 伊藤公二“世界经济同步萧条下的国际贸易变化与面临的课题”『2009 通商白皮书焦点
- [6] 解説』2009 年 7 月，第 28 页。
- [7] 王效平“世界金融危机对日资跨国公司的影响分析”林岗/王一鸣/黄泰岩主编『中国经济
- [8] 发展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362-391 页。
- [9] 王效平“震灾凸显日本经济转型之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
- [10] 『中日经济转型国际研讨会』发言稿，2011 年 9 月 2 日。
- [11] 王效平“日资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滞后的课题与原因分析”收录于 王效平 / 李思明 / 饶美
- 较合编『新世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07 年，448-464 页。
- [12] 『周刊东洋经济』2011 年 7 月 16 日。
- [13] 認定 NPO 法人言論 NPO『2011 年第 7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比較結果』，2011 年 8 月。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 Also on the Role Played of Hong Kong

Wang Xiao-ping

(The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Fukuoka county, city of Kitakyushu, 802-8577)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of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tortuous ‘politically cold and economically hot’ relation between them, which means China and Japan have built close economic connections but distant politic relations. Then it discuss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of Japan’s slow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Hong Kong in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Finally, it looks at the future of China-Japan cooper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m to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win-win mechanism and enhanc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Keywords: Dependence of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Economic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11-10-1

作者简介: 王效平,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工商官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专业领域为国际经营学。

【责任编辑: 关红玲】